

中國上古史綱

張蔭麟著

[illegible]

求道人立于此物上重意如夢夢覺立而意非是此物上後而亦不覺新
料此物上立而意如夢夢覺立而意非是此物上後而亦不覺新

張蔭麟著

中國上古史綱

里仁書局印

中國上古史綱

張其成著

發行人：徐秀榮

發行所：里仁書局

局版台業字第二〇九六號

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五樓之2

電話：3913325・3517610

印刷所：琦海印刷有限公司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九月五日

郵政劃撥：01572938「里仁書局」帳戶

FAX：3971694

張君蔭麟傳

王煥鑑

君諱蔭麟，無字，間自署素癡，東莞石龍鎮人。年十六，入清華學堂。梁任公得其文嘆曰，此入才也。君嗜書若饑渴，於學無不窺，而尤深於史。嘗以文插誌報，諸老宿多謝不可及。所作滋益多，迄殉不懈。凡學術論思之闡發，聖哲材藝之表揚，時議政事之覃究，孤本祕笈之覈證，海外名理之遙譯，幽能使之著，類能約之純，肆能不流，盡能不汙，都百餘萬言，名聲大起。清華卒業游美洲，入斯丹福大學，治西洋哲學社會學。曰：哲學將廣我以超放之觀，而社會學將喻我以人事之條貫也，吾一資以治史矣。返國，任清華大學教授。復爲教育部撰國史教科書。既受事，徧諮通人，商訂體例，析四千年事爲數十目，先鉤貫爲長編，而削成之，已定者才十之三耳。始，君受學任公，相尚以才識，故不以撓撓瑣屑爲問學之要。及爲史，雖皆舊聞，獨運以深湛之思，清新之筆，不以例證廁之，其體號嚴潔。自任公沒，二十年來，無此作也。嘗著通史原理。以爲史者，記新異以顯時空之變，述因果以明遞嬗之迹，陳流極以示實效之殊，溯往事以窮現狀之源，擷精英以張人文之重，別善惡以昭法戒之嚴而已。觀君所已試者，幾可以無憾矣。蘆溝橋事起，北平危，盡室而南。以浙江大學聘，講學天目山中。未幾，去之昆明，主講西南聯合大學。浙江大學遷遵義，君復至。平生志在通史，於有宋一代故實，尤嫻習而樂道之。搜宋人文集筆記始遍。論宋事諸篇，精審越古作者。讀書著文恆達旦，竟以疾卒，年三十有七。當是時，浙江大學三年間失名教授二，海內士莫不痛惜，謂君與章俊之用也。俊之精曆算，能以拉丁文原著校明季教士所譯書。年少於君而劬學攻苦則同。君意氣岸然，立言一衷於理，不蹈襲誰何人。惟低首墨子書，繫心齊民。稠人廣座，嘿嘿自致其思，應答輒不辭。或乘興

抵人瑕釁，非有意於傷人也。俊之居德久，慕尼采爲人，汪洋自得，世間得失無足動其意者。其父行嚴，用文學致顯仕，俊之乃蕭然若寒素，口未嘗及政事。君則侃侃好談當世利病，而實與俗多齟齬。嘗一抵陪京，任某職，留數月即去。由是寢多病；復諷籀道家言而好之，其思一變。疾革，猶誦秋水篇。君之真俊之之介，皆未易多觀也。禦倭軍興，國家銳意修內治，而積習未蠲，新弊踵起，學士大夫踴躍而莫敢言，或陳古以飾今，或舉細以遺大，泛焉無當於治道。君獨論曰，修明政治，不外任賢使能，賞功罰罪八字。八字不外一公字。公也者，不以政事達一己之鵠的，而以政事爲鵠的者也。公也者，內舉宜避親，外舉宜容讎者也。又曰：今日之患莫大於癱瘓。上之意無以貫於下，法令愈下行而愈離其本，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。凡所興作，有形而無神，多耗而少功。巨蠹積弊，上之人知之甚明而不能禁，禁之甚嚴而不能絕。此之謂癱瘓。又曰：爲政者必其身極修治之功，至誠而明，始能導民軌物，而免於非理之約束。意均剴切。他所嘗言多類此，有報章不敢流布而刊之身後者，以故人愈思焉。

論曰。孔子稱學而優則仕。仕固必出於學。況寇患方深，岌岌及故之時耶。顧徵之載籍，仕宦之途，守所學而躋，違所學而遂者衆矣。豈上下之相需，不在此而別有在歟。君之言，其大者足以興百年之利，平萬物之囂。既昭昭在人耳目矣，仕不仕無足計。余獨悲其書未成而病，病未及甚，而遽好老莊無爲之旨以自放也。（思想與時代第十八期民國三十二年一月一日）

哲學與史學

熊十力

——悼張蔭麟先生

吾國古之治哲學者，必精史學。宜聖開千古哲學之宗，而亦千古史家之大祖。司馬談父子，本史家，而論六家情要，則又深於哲學矣。夫哲學者，究天人之故，窮造化之原。而以不忘經世者爲是。印度佛家哲學思想，雖高深玄妙，而卒歸於宗教，以出世爲嚮向。故印度人於歷史特缺乏。民族式微，有以也。吾國先哲，於史學，哲學，嘗兼治而賅備之。究玄而基於綜事。窮理而可以致用。探微而察於羣變。極玄而體之人倫。廣大而不遺斯世。環球立國之古，族類之蕃衍，文化之高尙，無逾於我。皇漢者，學術之所繫，豈不重歟。張蔭麟先生，史學家也，亦哲學家也。其宏博之思，蘊諸中而尚未及闡發者，吾固無從深悉。然其爲學，規模宏遠。不守一家言，則時賢之所夙推而共譽也。蔭麟方在盛年。神解卓特。胸懷沖曠。與人無城府，而一相見以心。使天假之年，縱其所至，則其融哲史兩方面，而特闢一境地，恢前業而開方來，非蔭麟其誰屬乎。惜哉，其數遽止於此也。今之言哲學者，或忽視史學。業史者，或詆哲學以玄虛。二者皆病。昔明季諸子，無不兼精哲史兩方面者。吾因蔭麟先生之歿，而深有慨乎其規模或遂莫有繼之者也。故略書吾意，以質諸當世。（思想與時代第十八期）

張蔭麟先生的史學

張其昀

張蔭麟先生於（民國三十一年）十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三時在滬義逝世，享年三十七歲。他於去年十一月間曾患血壓太高，鼻孔流血，至本年七月間發現小便有血，旋進貴陽中央醫院，診斷爲慢性腎臟炎症，需要靜養。本學期未授課，旬日前患失眠，病勢轉劇，羣醫束手，作者馳赴重慶，延醫診治，因途中覆車，歷四日方達，抵渝後請醫官金誦盤先生乘專車赴邊，作者隨行，至東溪站，站長告以適接重慶電話，蔭麟兄於今晨去世，原車折返重慶，痛悼極。他的生平及其在學術上的貢獻，他的至友當有詳文紀念。茲就作者近年交遊講論所及，含淚濡墨先述此篇，以抒哀感，以代赴告。

民國十五年作者在東方雜誌發表「金陵史勢之鳥瞰」一文，承蔭麟兄撰爲提要，刊在清華學報附篇中，是爲吾二人文字縮交之始。在抗戰以前，我們僅會晤兩次。民國十八年夏，蔭麟兄在清華大學畢業，赴美留學，作者適以事經滬，由王以中兄之介紹，獲一夕之暢談，以後他在美國斯丹福大學攻哲學四年，自稱「居西美一僻鄉，與世絕緣，真成韜隱。」回國後即在母校清華大學任教。民國廿四年夏，作者自西北漫遊而歸，道出北平，訪蔭麟兄於清華園，他與其新夫人一同進城，爲我洗壺。蔭講橋事變以後，他隻身脫險南下，就國立浙江大學之聘，住天目山禪源寺，爲新生講史學。浙大幾度播遷，他回故鄉廣東東莞，後在西南聯合大學授課，至二十九年浙大遷至黔北遵義，他亦重來本校，迄今二年有餘。

民國二十二年三月間，他從美國寄我長函，自述志趣，略謂「國史爲弟志業，年來治哲學治社會學，無非爲此種工作之預備。從哲學冀得超放之博觀，與方法之自覺，從社會學冀明人事之理法。」

在其前他曾惠寄長稿，題爲「傳統歷史哲學之總清算」，爲刊於國風雜誌二卷一期。（二十二年一月出版）回國以後，專精於中國史綱之撰述，其初稿曾在大公報發表一部分，其上古史之部，經改訂後，刊爲「中國史綱第一輯」，於三十年三月由國立浙江大學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。宋史之部曾在「思想與時代」月刊發表兩篇，預定陸續整理刊佈，因病中輟。他自序說明寫此書時所懸鵲的如下：（一）融會前人研究結果，和作者玩索所得，以說故事之方式出之，不參入考證，不引用或採用前人敘述的成文，即原始文件的載錄，亦力求節省。（二）選擇少數節目爲主題，給每一所選的節目以相當透澈的敘述，這些節目以外的大事，只概略地涉及以爲背景。（三）社會的變遷，思想的貢獻，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，兼顧並詳。中國史綱一書是嘔心血的著作，他常常工作至午夜以後，因此就深伏了病源。本書價值，識者自有公評，即就文字而論，亦用力至勤。世人多驚羨其文筆之粹美，以爲勝過一般文學創作，不知其字字珠璣，皆爲潛心涵泳幾經錘鍊而後成。他是一位飽學之士，能禁其閱書，而不能禁其運思。他念念不忘於史綱之完成，雖在病中仍精思不休，而病勢遂陷入深淵。

蔭麟兄是思想與時代社最初之發起人，去年四月間，作者因事赴渝開會，先一夕走訪蔭麟兄於其寓舍。其時他住在遵義老城石家堡三號第三層閣樓，窗前竹樹森蔚，湘川在望，據全城登眺之勝。吾二人縱談至夜深。談話結果我們擬糾合同志，組織學社，創辦刊物，在建國時期從事於思想上的建設，同時想以學社爲中心，負荷國史編纂之業，刊行「國史長編叢書」。蓋以國史艱鉅之業，決非少數人力所克負荷，斷制營構，固須自運匠心，至若網羅散佚，分析史料，及各方面之綜合，則非資衆手不可。擬約集同志，先成一國史長編，此非徒爲少數人謀，後來任何有志通史者，均可用爲資藉。此長編不必有一貫之統系，各冊自成段落，爲一事一人一制度一時代或文化一方面之專史，謂爲叢雜之

論集亦可，要以於國史知識有新貢獻者爲準。各冊隨得隨刊，不必按倫類或時次編排，這是我們共同的理想。是晚話別，他從曲折的幽徑，送我到門口。此時遵義山城百花盛開，在純潔的春夜，和風送來一陣清香，誦「數點梅花春讀易」之句，相爲歡樂。他是多麼精壯，多麼興奮，回首不過一年多以前的事。

戰時物力維艱，印刷困難，我們編輯月刊和叢書的計劃，原不敢期望短時期即能實現。其後作者因事暫爲將委員長，承勗以集合同志，致力於言論事業，及聞我等有此計劃，備加鼓勵。作者回遵義後，復與幾位知友往復函商，於是思想與時代社遂於去年六月正式成立，八月一日創刊號出版，事先本擬請蔭麟兄撰發刊辭，他謙讓不遑，後來決定以一簡單的微稿條例表明本刊的性質。但是蔭麟兄發起斯刊的宗旨，是作者耳熟能詳的。

他對革命二字有極深透的見解，他常說吾儕有要務曰讀易，曰讀史。「作易者其有憂患乎？」是的，但那可不必是一己身世的憂患，却必是對於人類命運的憂患。「數點梅花春讀易，」古人認爲是很值得流連的境界。春是萬物滋生的時期，數點梅花是萬物滋生的象徵，而易的着眼處在生命，故曰「生生之謂易。」什麼東西可以急，生却不能急；讀易使人感覺雍容，感覺冷靜。革命的成功決不是突然的，偶然的，在瓜的生長裏，只看見帶落的人不配談種瓜，在革命裏只看見暴動的人不配談革命。易就是變易，革命就是變易的一種，以一種新的社會秩序易一個舊的，終於歸到易，革命的名詞從易經革卦出來的。社會秩序是活的，原是一個有機體；所以革命的命要當作生命解，只有創造新的生命才能革掉舊的生命。哲學的理論就是宇宙秩序的描寫，政治的主義就是改變人間的秩序的計劃。我們對於某種哲學理論的從違，乃是我們對於某種政治主義的從違的決定因素之一。政治家不能忽視哲

學，尤其是流行的哲學思想，其原因之一在此。

「亢之爲言也，知進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喪。其惟聖人乎！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惟聖人乎！」這一段話就聲情和義蘊說，都是光燄逼人的。很明顯的，這一段是對於主持政治的人的箴言。以今語釋之曰：「一政策之實行，或可以爲進步，或亦可以爲退步，或可以興邦，或亦可以喪邦，若壹意直行，不反顧焉，則亢也。」執兩用中，乃得正路，惟聖人能之。嗟乎！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，原非所以期於不以深思遠計爲命之人也。若乃聚一世之所謂才智之士，使操歷史之舵，而所爲乃無減於亢焉，則覆轍相循，何時得已？贊易者其深於史乎？宋以後之浙東學派，言性命者必衷於史。近十餘年來我國哲學界風氣似趨向於一種「形式主義」，凡把握經驗世界之真實血肉之哲學，悉屏置之不道，而史學界又往往徇考據而忘通義，易於流入玩物喪志之途。吾儕有急務，曰讀易與讀史。

蔭麟兄於近代學者對梁任公尤有一往情深之感。作者曾錄存任公遺札中語數十事，他慫恿刊佈，作者因撰爲「梁任公別錄」一文，他親爲之跋。（載於思想與時代第四期）其結語謂「任公之學所造最深者惟史，而學人之譬之者亦在此。實則任公所貢獻於史全不在考據。雖然考據史學也，非史學之難，而史才實難。任公在『新漢學』興起以前所撰記事之巨篇，若春秋戰國載記，若歐洲戰役史論，元氣磅礴，銳思馳驟，奔沙走石，眉飛色舞，使人一展卷而不能自休者，置之世界歷史著作之林，以質言而不以量言，若吉朋，麥可萊，格林，威爾斯輩，皆瞠乎後矣。曾試自操史筆之人，讀此種書而不心折者，直無耳耳。」十月三日國民政府明令褒揚梁任公，他在病榻中，作者報告此消息，他坐起，謂政府愛惜士類的盛心，影響所及，一定是異常深遠的。

九一八以後，作者接其自來書，略謂：「當此國家棟折橫崩之日，正學人鞠躬盡瘁之時。」又謂：「國事目前誠無使人樂觀之餘地，然吾人試放遠眼光從世界史趨勢看來，日寇之兇焰決非可久者。然中國否不極則泰不來。且放硬心腸，佇候大河以北及江海沿岸之橫遭蹂躪可耳。歷史上腐化之時代而能爲少數人道德的興奮所轉移者，殆無其例，必有假於外力之摧毀，摧毀之甚而不致於亡則必復興。弟於國事對日前悲觀，對將來則並不悲觀」。其評議時事具有史識類如此。其所著「從政治形態看世界的前途」一文，（載於思想與時代第三期）於世界第二次大戰同盟國所操之勝算，亦有透關的觀察。

蔭麟兄以爲民族復興的根本大事，當在教育改革，德哲費希德之前例，可爲吾人師法，而今熱心從事其學識人格足以副之者何其寥寥耶？國事之可憂固不止一端。故教育改革之精義在於改造自己，能改造自己方能改造社會，復興祖國。在其所著柏格森一文（載於思想與時代創刊號）結語中，曾闡發此意，略謂：「夫生命之發皇無在而非創造，然藝術哲學之創造，以至事功上之創造，非人人時時所能爲力也。有一種創造焉，爲人人時時所能者，即以自我創造自我，由一切庸德之實踐，以恢宏其人格，而宇宙亦於以日新而日富，所謂成己而成物者，其在斯乎？其在斯乎？」教育之尊嚴尤在於教師之自尊自愛，吾國古來學風最重節操，大帥宿儒，其立身行己，靡不措意於斯，雖在窮困之時而守志彌堅。漢申屠蟠所謂安貧樂潛，味道守貞，不爲燥濕輕重，不爲窮達易位，最能形容其精神。近年物價波動劇烈，教師生活至爲清苦，一般教師雖免見異思遷，喪其所守。蔭麟兄最近於病榻口授一文，囑弟子徐規君筆述，題爲「師儒與商賈」（載於思想與時代第十六期）針砭時弊，義正辭嚴，竟成爲他的絕筆。

吾二人之友誼淵源於史地關係之結合。他給我一信曾說：「地理與歷史可稱為姊妹科學，其相輔相成之處甚多，治一時代之史而不明其地理環境，猶演戲之無配景，烏乎可？弟深愧於地學毫無素養，他日必先於本國地質地勢稍加考究，並恣游秦晉宋魯之故墟，然後敢下筆寫國史也。在此種預備中，其有需於吾兄他山之助，從可知也。」他近著「論中西文化的差異」一文，（載於思想與時代第十一期）曾抉發此義，略謂：「就社會生存上看，過去中國的文化始終是內陸的農業的文化，而西洋文化自其導源便和洋海結不解的關係。這種差異從兩方面的文學也看得出。洋海的文化 and 內陸的文化，二者各有其利弊。孔子說：『智者樂水，仁者樂山；智者動，仁者靜，』我們也可以說，洋海的文化恰如智者，尙知；內陸的文化恰如仁者，尙德。洋海的文化動，所以西方的歷史比較的波瀾壯闊，掀起社會基礎的急劇革命，頻見疊起。內陸的文化靜，所以中國的歷史比較的平淡舒徐，其中所有社會大變遷都是潛移默運於不知不覺。洋海的文化樂水，所以西方歷史上許多龐大的政治建築，都是其興也勃焉，其沒落也忽焉，恰如潮汐。而中國數千年來屹立如山。」真正的新文化應該是東西文化長短相補，蔭麟兄鼓吹海國思想，實為新時代的晨鐘。

蔭麟兄在遵義山城，宏開講壇，青年學子如坐春風。作者近三年來亦深得過從之益，每成一文，輒先呈教，蔭麟兄不憚細心改定，一語之褒，為之色喜。今後賞奇折疑之樂，何可復得？哲士凋零，夏月凝霜，天奪斯人，傷痛何極！半年以來，作者既哭林文英君，又哭蔭麟兄，二君皆粵人。蔭麟兄雖早逝，其在學術上之貢獻，除中國史綱外，在各學報所發表之史學論文，累數十萬言，論其著作，誠可謂憂憂獨造，自闢戶牖，卓然成一家言。思想與時代月刊尚在創辦時期，他實際負起掌持文衡的責任，於甄選稿件不辭勞怨，以期樹立本刊嚴格之標準。將來本刊對時代思潮果能稍有貢獻，我們永

遠忘不了這位最可敬愛的創議人。在政治上，廣東奠定了中華民國的始基，在經濟上專僑開拓了海外發展的機運，在學術文化上，像薩麟兄所代表的宏博堅實的學風，深信必能繼往開來，垂諸不朽。（民國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）

張 蔭 麟

謝幼偉

一

東莞張蔭麟先生（民前六年—民三十一年，西元一九〇五—一九四一）在百年來的中國文化上，他是可以佔一相當重要的地位的。他是一位天才史學家，也是一位聰穎的哲人。他的著作雖不多，但他生前所寫的一部「中國上古史綱」（民四二年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），及他死後，由倫偉良編輯的一部「張蔭麟文集」（民四五年教育部中華叢書委員會印行），都是當前學術界很少人可以寫得出的。他的文章，他的學問，他的品格，他的天才，都對中國文化有不可磨滅的貢獻。本文之作，即根據作者所知，而略述其貢獻之所在。

首先，我們得瞭解張蔭麟先生的生平與為人。目前我們尚沒有關於張先生的詳細傳記。我們所知道的，自然都很簡略。我們知道他是廣東東莞石龍鎮人，年十六，即考進北平清華學堂肄業。但十六歲以前，他在家鄉的幼年生活，我們便毫無所知。他少年聰穎，自不必說。所以一進清華，梁任公先生得其文，即驚為天才。（此其文可能是指張先生於民十二年十月在學衡什誌上所發表的一篇「老子生後孔子百餘年之說質疑」一文而言。這是批評梁任公先生之說的，那時張先生不過十九歲左右。現此文已收入「張蔭麟文集」中，頁四九—五二）。唯彼在清華讀書的一段生活，作者亦無所知。因作者之與張先生的相識，乃在張先生由清華派往留美之初。這是民十八年的秋季。我們同在克里扶倫總統號輪上，由上海開往西雅圖的途中，有十多天的聚首。這次的留美學生，約有三百餘人，大部分為

清華學生，可是其中擬赴美習哲學的，似僅我和張先生二人。這是我們相識的主因。輪上我們雖時有所談，但所談為何，作者現在亦不復記憶了。

在美留學期間，作者與張先生，居地不同，一東一西，未通訊，亦未見面。所知的是，張先生初習哲學，後又改習社會學。理由爲，張先生之所志，不在哲學，而在國史。民二二年，張先生有函致張蔭峯（其昀）先生云：「國史爲弟志業，年來治哲學治社會學，無非爲此種工作之預備。從哲學冀得超放之博觀，與方法之自覺，從社會學冀明人事之理法。」（見張其昀著：「張蔭麟先生的史學」，原刊「思想與時代」月刊，後刊入張蔭麟文集「卷首」。）試問今日之治史學者，誰能有張先生如此之預備工作？而此種預備工作又是否必要呢？這是可從張先生史學上的成就而獲得答案的。

張先生何時自美學成歸國，作者亦不確知，大約在民二三或四之際。回國後，他初在清華任教。抗戰軍興，他改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。民二九年；他始從聯大轉來貴州遵義之國立浙江大學任教，與作者同事。這是作者和張先生過從最密，談話最多的時期。關於這一時期的談話，以及張先生的爲人與性格，作者曾有一文，題名爲「張蔭麟先生言行錄」，詳加敘述。（按此文初刊杭州東南日報，後刊入「張蔭麟文集」卷首，讀者可參閱。）因而在這裏不擬對張先生的爲人，再有說話。這裏作者所欲說的，乃是張先生和曉峯先生合力創辦「思想與時代」月刊的一件事。這一件事無疑對中國文化是有極大的貢獻的。

「思想與時代」月刊之創辦，自然主要是曉峯先生的力量。但曉峯先生却認爲張蔭麟先生亦爲發起人之一。他在「張蔭麟先生的史學」一文中曾說：「蔭麟兄是思想與時代社最初之發起人，去年（按指民三十年）四月間作者因事赴渝開會，先一夕走訪蔭麟兄於其寓舍。其時他住在遵義老城石家堡

三號第三層閣樓，窗前竹樹森蔚，湘川在望，據全城登眺之勝。吾二人縱談至深夜。談話結果我們擬糾合同志，組織學社，創辦刊物，在建國時期從事於思想上的建設，同時想以學社爲中心，負荷國史編纂之業，刊行「國史長編叢書」。這是曉峯先生自述「思想與時代」月刊產生的緣起，張蔭麟先生之有功於此一刊物，當爲事實。而此一刊物之有功於中國文化，亦應爲吾人所共認。

吾人所不能不承認者，以抗戰期間的刊物言，「思想與時代」月刊，可以說是學術水準最高的一種。它不是專門性的刊物，然也不是通俗性的刊物。它以中國知識份子爲對象，而思以當代哲學，文學，史學方面的思想，特別是有關中國文化方面的思想，作較深入的介紹的。它和目前流行的刊物，至少有下列三種不同的特點：第一，它不刊登多由秘書代筆的所謂黨政要人的文章，第二，它有六七位基本撰述人，而每期至少有二三篇是這些基本撰述人的文章，第三，每一篇文章的刊登，必須經過二三位基本撰述人的審核，有一人不同意時，即難有刊登的希望。據作者所知，張蔭麟先生就是基本撰述人之一。他擇和拒徵，甚至另一位基本撰述人的文章，都曾爲他否決過。「思想與時代」月刊之所以維持其高度的學術水準，蔭麟先生之功是不可沒的。故如吾人承認「思想與時代」月刊對中國文化有貢獻時，自也不能不承認蔭麟先生對中國文化亦有貢獻了。

不過，蔭麟先生對中國文化的貢獻，決不止於「思想與時代」月刊這一事。這只是就他的生平中所曾經辦的一件事而言，一件最有意義最有價值的事而言。他的貢獻，主要在他的史學，次則在他的哲學。以下將依次述之。

二

一提起張蔭麟先生的史學，作者的感慨是極大的。他在史學上的成就，以所遺留的著作而言，自然不能算大。可是他在「中國上古史綱」上所定下的通史規模或樣法，以及他在「文集」內有關史學文章所表現的史識和史法，則是今日的史學家很少可以望其項背的。他應有極大的成就，而終不能有極大的成就，這是年齡所限，天實爲之，非張先生個人的過失。以張先生的史識和史法，加上他的學問和天才，稍假以年，則其成就，我們是可以想像得到的。即以他已有的成就而言，我們一樣不可忽視。蓋作者認爲張先生已有的成就，一在他遺留下一部良好的通史模楷，二在他遺留下一種深刻的史識或史觀，三在他遺留下若干謹嚴的史法。

先從通史的模楷而言，張先生所著的一部「中國上古史綱」雖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中國通史，但我們只讀其所已完成的部分，我們便不能不承認張先生已爲中國通史樹立了良好的規模。這規模是，最主要的，張先生替我們定下了選擇史料的標準。蓋張先生認爲寫通史所首先遭遇到的一個困難問題，乃是「拿什麼的筆削做標準？顯然我們不能把全部中國史的事實，細大不捐，應有盡有的寫進去，姑勿論一個人，甚至一整個世代的史家沒有能力去如此做。即使能如此做，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檢查的『中國史百科全書』，而不是一部供人閱讀的中國通史。」（見中國上古史綱自序，頁二）因而史料的選擇，是必要的。可是以何爲選擇的標準呢？張先生認爲現成的答案是「重要」，即重要的史實加以選擇，不重要的，便不加以選擇。但問題是，「重要」這一概念，仍是含糊的，「在史事的比較上，我們用以判別重要程度的，可以有五種不同的標準。這五種標準並不是作者新創出來的，乃是過去一切通史家部分地，不加批判地，甚至不自覺地，却從沒有嚴格地採用的。」（同上，頁四）這五個標準是，第一爲「新異性的標準」，這就是說，一件史實在時間空間上爲少見或罕見的，即是重